

22.01

第六辑

8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贵阳市南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南明文史资料选辑

南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贵阳市南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8年9月出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贵阳市南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委员：左 骥

副主任委员：蒋相浦 简锦堂

委 员：何静梧 吕传镛 傅作相 易炳荣

毕仲良 姜义佑 邱元利 魏觉民

主 编：蒋相浦

副 主 编：简锦堂

编 辑：曾庆贤 张永龄 黄 炜 易舜恺

地址：贵阳市箫道街153号

电话：26991

目 录

民国后期的贵州中国银行.....	钱存浩 (1)
解放前的贵阳交通银行.....	李世湘 (9)
邮政储金汇业局贵阳分局概述.....	胡致祥 (17)
抗战时期贵阳兴起的商业银行.....	冯家楨 (22)
贵州省银行演变述要.....	张文俊 (32)
贵州省农村合作委员会述略.....	吴道一 (47)
贵州企业公司成立前后.....	金发棣 (57)
抗战期间贵州企业公司部份工矿业简况	戴广德 (63)
回忆解放前贵阳的经济发展概略	朱志国 朱林祥 (69)
解放前贵阳的制革工业.....	胡先礼 (73)
解放前贵阳的钢笔业.....	张幼文 (78)
忆贵阳福田玻璃厂.....	刘裕远 蒋 萍 (80)
华之鸿与永丰抄纸厂.....	何静梧 (83)
刘熙乙与贵州经济.....	任可知 胡大尧 (90)
伍效高生平述略.....	伍政宪 毛灿英 (106)
记乐森珥谈贵州的四大矿产.....	杜松竹 (112)
湛湛溪博上简介.....	王 棋 唐启厚 (120)
民国时期贵阳银楼业简况.....	石国梁 (123)
解放前货币贬值琐忆.....	张运昌 (126)
贵阳大十字忆旧.....	近 愚 (132)

回忆贵阳的“广东街赶场”	张汝芳 (144)
忆贵阳市的川味“四村”	白天白 (147)
贵阳尚节堂的特产蜜饯——木瓜、柿子、刺梨	唐启厚 (152)
解放前贵阳市工人职业团体概况	王宇文 (157)
解放前贵阳的电影院	王少西 (161)
解放初期的贵阳乡村邮政	熊传勋口述 熊胜阳整理 (165)
忆周西成办的电话学校	吕传鏞 (168)
忆贵阳中华职业补习学校	傅作相 (170)
火烧三牌坊始末	刘泳唐 (174)
太慈桥的来历	周作正 赵无书 (176)
图云关一件旧事 ——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简锦堂 (178)

民国后期的贵州中国银行

(1938.12——1949)

钱存浩

中国银行是民国年代在国内外负有盛誉的一个金融机构，也是我国最早插足海外——英国伦敦与日本大阪等地设立分行的华资国家银行。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发布命令：将原设上海的“大清银行”改组成立“中国银行”。民国二年（1913年）农历8月，南北统一，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成立，总裁一职，由财政部任命，与交通银行及其它中外银行同等的享有发行银元兑换券的权利。由于当时我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状态，外资银行如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等在华金融实力雄厚，并已控制与垄断了我国的外汇市场与资金市场；中国银行在民国六年（1917年）前，实收资本总额尚不足银元一千万元（1920年实收资本1,229万元，其中官股为500万元），在业务上既不能与外资银行抗衡，在行政上也不能行使对外资银行和本国商业银行的管理权，甚至我国部份国税（关税、盐税）收入，根据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规定，尚须缴交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德华银行收存保管。由此可见，当时该行虽有发行货币与经理国库的特权，名义上曾一度经财政部认定为我国的“中央银行”（见民国二年财政部致外交部转知

各国银行“中国银行系国家中央银行”的函），但实质上并不是如今人所想象的是一家“银行的银行”。

民国四年（1915年）1月，中国银行在黔设立贵州分行，历任经理有唐士珩、熊范舆、蹇先陶等，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清理结束，这一期间，该分行受省政当局委托，接办贵州金库业务；与省财政厅签订合约，借款150万元以稳定“黔币”的市场价格；大力支持护国倒袁战争；经营汇兑和商业信用票据贴现业务，开拓资金横向融通的渠道，促进贵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因贵州政局多变，地方军政当局杀鸡取卵，强制提用该行发行兑换券装备金现银60余万两，以致该行所发兑换券贬值流通，丧失信用，至1929年被迫停业清理结束等种种史事，笔者已有专文论叙（详见1987年第二期40页《贵州省地方志通讯·民初贵州中国银行史略》），不再赘述。现将该行民国后期（1938年12月～1949年）的主要业务概况，简介如下：

一、复业后执行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年，祖国华北大好河山及东南沿海重要省市，相继沦入敌手。南京国民政府定重庆为战时陪都。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为适应战时工作需要，安置沿海行处的撤退人员，寻求资金出路，加强对西南地区金融事业的控制，于同年冬调派石家庄支行经理赵宗溥、会计主任赵菊轩、出纳主任葛国庆等同来贵阳，临时租用中华南路（今南明区辖区内）民房，略加修缮，于12月25日再度建立机构，恢复营业。随后即在省内公路沿线遵义、桐梓、思南、凤岗、湄潭、永兴场、安顺、独山、都匀、镇远、黄平旧州、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威宁等15个城镇及贵阳铜像

台（今喷水池附近）、三桥镇，先后建立办事处、办事分处，支持地方政府复兴贵阳灾区（指“二、四”敌机轰炸贵阳成灾），发放建筑房屋贷款；向总处请调专用资金筹组贵州企业公司；为建立地方性金融机构——贵州银行出谋献策，提供专项借款；推进地方合作金融事业，辅设镇宁、平越（今福泉县）、瓮安、榕江等县合作金库，承办黔南、黔东南剑河、台江、荔波等十一个贫困县的农业生产贷款；推行法币及美金节约建国储蓄运动，组织法币及美金等外币各项存款，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发放工矿企业生产贷款，办理食盐抵押贷款，扶持仁、永两岸川盐运销业务；沟通国内汇兑，承解海外华侨赡家汇款和东南亚地区华侨热烈支持祖国抗战所汇入的各项捐献款项；接受中央银行委托代理独山等地国库支库业务，为修建黔桂铁路所需工程费用提供服务；为建设西南后方抗日基地，发展贵州商品经济，支持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该行自1939年正式营业至1942年，市场物价上涨速度是抗日战争中较为缓慢的一个时期，货币发行量约增加7.1倍。该行这一阶段的业务，如以1939年年终为基数，至1942年6月，经过两年半的时间，贵阳支行各项定、活期存款总余额自1千万元（指法币，万元以下另数用四舍五进法计算）上升至3,790万元，其中军政机关存款为2,274万元，占60%，工商业为833万元，占22%，个人及其它为682万元，占18%，计增长2.8倍。为当时国家四银行存款总余额13,764万元的27.54%。相当于贵阳市上海、金城、聚兴诚、美丰、亚西、重庆等六家主要商业银行存款总余额5,935万元的63.86%。同期各项定、活期储蓄存款自40万元上升至563万元，计增长

13倍，为当时全省各行局（包括邮政局及商业银行）收储总额4,611万元的12.22%。各项放款（包括定、活期抵押透支与贴现等）亦由116万元上升至1,115万元，其中军政机关放款为114万元，约占10.22%，工商业为720万元，占64.57%，其它280万元，占25.11%。计增长9倍，相当于同期贵阳市上海等6家著名商业银行放款总余额611.5万元的182.34%。投资总金额自170万元上升至806万元，增长3.74倍，主要对象为贵州企业公司及贵阳中国国货公司。该行汇出汇款自1939年度累计总款的3,357万元（如按市场银元价格计算，约为1,119万元）上升至1942年度累计总款的18,628万元，计增长4.55倍；汇入汇款亦自1939年度累计总额的3,452万元上升至1942年度累计总额的24,580万元，计增长6.12倍。据1942年6月的统计数据分析，贵阳该行汇出汇款以广西柳州、梧州及湘西邵阳、洪江及省内各地为主，汇入汇款多来自重庆、昆明及省内各地。就汇款性质而言，汇出部份军政机关占25.59%，工商业占57.54%，其它及个人占16.87%；汇入部份军政机关占32%，工商业占30.85%，其它及个人占37.15%。盈余金额亦自1939年度的32.3万元上升至1942年度的300万元（缺档案数据，系依1941年度全年盈余金额对照1943年1~5月盈余金额参考1942年营业额进行估计），计增长8.29倍。

二、日本投降后，机构紧缩，重心东移

1942年5月国民政府为加强中央银行职能经四联总处决定，重新划分国家四银行业务，取消了中国银行享有的货币发行特权。次年，财政部为加强对全国金融事业的全面管理，决定分区设立银行监理官办公处，对各行（局）、庄执行严格审查制度，并首先检查了贵阳、安顺、遵义、独山等地的

中国、交通银行工作。随后贵阳中央银行开办票据交换业务，规定各国家银行（局）应将全部资金集中存放于中央银行。该行虽经指定办理进出口外汇及侨汇业务，仍为金融决策机构——四联总处贵阳分处主要成员之一，属于国民政府御用的国家银行，实质上省内进出口贸易因交通阻滞，中、小出口商资力薄弱，无力组织商品直接出口换汇，省内主要出口矿产品及桐油、猪鬃等农副产品，均由资源委员会、贸易委员会及其所属单位复兴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厂统购统销。外汇收入价款均在香港或国外其它地方划拨，国外汇入汇款及进口商所需外汇资金，则因中央银行所订外汇牌价与市场汇价，相距悬殊，国家无法控制黑市活动。以致抗战后期，该行外汇业务，除因支付美金储蓄券到期本息，开出美金汇票外，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其它业务，亦因通货膨胀，国民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银行行政与经济的管理权力，从而大大削弱了该行的实力地位。

1944年冬，日寇进犯黔南，该行收缩商业性放款，并将库存现金、重要物资、全部文书档案与帐册，以及全体职工家属（仅留少数青年职工驻守贵阳待命）分向桐梓、毕节方向进行紧急疏散。不久，日军后撤，又复出动大批车辆，往返搬迁，造成该行及有关工矿企业极大的经济损失。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省内各地物价一度狂跌狂涨。该行在总管理处统一部署下，先后裁并省内独山、桐梓、大方、威宁、毕节、安顺、思南、凤冈、湄潭等地办事机构，外省籍人员纷纷他调，我国金融中心随之东移。

三、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金融业陷入困境

1946年后国民政府撤毁和平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执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市场物价飞涨，游资趋向金钞买卖，国家重大金融经济政令，朝令夕改，举棋不定；更因军事失利、政治腐朽，大失民心，市场银根奇紧，钞荒严重，银行本票泛滥，面值百元以上大钞相继出笼，金融秩序异常混乱。该行资金来源日益不足，乃无视农民生计维艰，贯彻执行国民政府金融政策，通过县、乡政府，强制摊派“乡镇公益储蓄券”，终以民穷财尽无补实际。该行处此窘境，不得不仰赖中央银行办理出口物资转质押，再贴现贷款；占用异地联行短期资金，充裕头寸，更不顾社会影响，进入市场，比照市场利率、汇率，多方揽做即期、远期对交及买汇等各种调拨性的、结算性的短期放款。如1947年年终决算，该行存、放款业务与1942年6月底余额比较，各项存款余额为311,844万元，增长81.28倍；各项储蓄存款余额为28,466万元，仅增49.56倍，各项放款余额为628,861万元（包括贴现、买汇390,600万元，其它质押放款238,261万元），计增长563倍；截至1947年年终，该行对工矿、贸易企业的投资总额共达213,643万元，为1942年6月806万元的264倍。其中投向贵州企业公司部份增为197,806万元；贵州煤矿公司因开发林东煤矿修筑简易公路，经贵州企业公司就其原有股权中转让，由中国银行直接投资15,700万元，其余137万元，则为贵阳中国国货公司因增资由该行投入的股款。1947年全年该行汇出、汇入汇款累计金额分别为9,534,538万元和7,920,306万元，较1942年全年汇出、汇入累计总额增长511倍和321倍。该行1947年度盈余金额为363,873万元，为1942年纯益估计数的1213倍。上述统计数据，虽有显著的、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同期银元市价涨得更快，1947年12月银元1元值法币7万元，增长幅度约为2,032倍，即1947年年终各项存款余额，仅相当于银元44,549元；各项储蓄存款相当于银元4,067元；各项放款相当于银元89,837元，其中期限在5天左右的拆放，买汇、贴现等项占62.11%，约为银元55,800元；1947年全年汇出汇入累计金额相当于银元1,362,076元和1,131,472元；1947年全年盈余金额相当于银元51,982元。如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就1947年统计数与1942年以前各年比较，就大为逊色了；如以物价指数为标准，后期与前期的差距更为突出。就其业务规模与经济实力而言，只相当于抗战初期的一家小钱庄。

1948年8月后，国民政府日暮途穷，一再玩弄币制改革丑剧，继续执行通货膨胀政策。同年11月颁发《修订金元券发行办法》，将金银外币与金元券的兑换比率提高了4倍，加深了金融市场的危机，该行业务更为萧条。1949年5月，国民党政权首都南京解放，贵阳市各银行、商店改以银元为记帐单位，业务一蹶不振。该行职工的正规待遇无法维持，每人每月仅发生活费银元10元，实为该行有史以来所仅见。足证该行已陷入瘫痪状态。

四、贵阳解放，全体职工热情参加人民金融行列

1949年下期，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在国民党政权的严密控制下，发出通告，鼓励各地职工申请办理退休、退职手续，领取一笔可观的规定待遇和全体家属成员一并在内的“回乡”旅费。当时贵州省内尚保留了贵阳支行和遵义、都匀两个办事处，共有职工150人。他们通过专用电台与解放区联系，认识到全国解放是大势所趋也是各族人民的殷切希望，大家在

中国共产党英明政策的指引下，决心留行迎接解放。笔者当时任该行经理之职，一面请求上级行调集资金，安排本行及有关投资企业职工家属生活，团结全体职工包括花溪清华中学全体校工，坚守岗位；一面加强保卫力量，订出护行措施，切实保全库存金银、贵重财产及全部文书档案、帐表不使散失，对有关投资单位也通过各单位负责人作出相应的布署。解放后立即报到，热烈欢迎军管会财政接管部金融处负责同志张廉方、余潜、王昭浦、田纪英等来行接管。迅速、完整、井然有序地办理了移交手续，受到金融处的表扬。1950年1月沿用“贵阳中国银行名称在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的直接领导下，由人行省分行张廉方行长兼任经理，笔者与田纪英同志任副经理，对外营业。与人行营业部、贵阳交通银行紧密配合，开展各项银行业务；同时抽调部份骨干力量如会计主任蔡承烈、营业副主任王积曹等参加省人行会计、检查等科室任股长，襄理舒振钧亦经调任人行中华北路办事处主任，加速了人民金融机构建设的进程。同年7月机构调整，贵阳中国银行暂告结束，全体职工均经人行调派，继续参加人民金融战线积极工作，为支援前线、恢复经济秩序，建立人民金融机构，健全人民金融事业的管理制度，进一步拓展银行业务，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多年来，已有不少的青年职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肩负起重任。

解放前的贵阳交通银行

李世湘

交通银行（以下简称“交行”）是清末邮传部奏准清廷于光绪年间设立的专业银行，是继中国通商银行、大清户部银行之后我国成立较早的银行，也是解放前国内四大国家银行之一。它历史悠久，分支行处及代理机构遍及全国及世界重要城市，在中国近代金融界占有特殊地位，对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贵阳交通银行于民国28年（1939年）初在贵阳成立，其后陆续在安顺、遵义、都匀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949年11月贵阳解放后，该行经人民银行指定为办理基本建设拨款的专业银行，直至1954年10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贵州省分行成立才宣告结束。现就该行成立经过、性质及其主要业务活动，概述于后。

（一）

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采取种种手段大举侵略中国。俄比、英、法复挟其巨额资本，争夺在中国的修筑铁路权，掠夺铁路沿线资源，引起全国人民强烈愤慨，各地不断掀起保路斗争风潮。清邮传部为了筹款赎回向比利时借款修筑的京

汉铁路，管理轮、路、电、邮四政收支，奏准清廷筹设“交通银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二日，交行总行在北京筹组，次年正式营业，到民国25年(1936年)止，交行在全国设立的分支机构达172处，在国外的新加坡、香港、西贡、菲律宾、仰光、河内、加尔各答等地也有它的分行，并在伦敦、纽约设立代理机构。

交行创办之初，采取“官商合办”方式，股本总额库平银500万两，邮传部拨官股四成，招募商股六成，其后多次调整资本，到民国17年(1928年)11月，实收股本7,715,150元，其中属于国民政府交通部的官股为780,000元，仅占股本总额的9.89%；商股为6,935,150元，占90.11%^①。1933年，国民政府发行金融公债1亿元，以1,000万元债券拨充交行官股，使官股比例占该行股本总额达到60%^②。

交行于清末建立后，大权掌握在清朝官员手中，为挽救清王朝的覆灭效力，发行“收赎京汉铁路公债”，并依附帝国主义势力出面向英、法借款500万英镑。民国以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交行筹募公债达946万元，垫付军政费用达3,115万元，成为北洋政府一大金融支柱。民国17年(1928年)，北洋政府覆亡，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国民政府特许交行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给予发行兑换券，代理国库、发行债票和经理交通事业公款收付等特权。该行凭借上述特权，从1911至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前夕，共发行兑换券1.04亿元，而在实行法币政策后，该行陆续收兑银元达1.13亿元，其它存放汇款业务也迅速发展，垄断地位不断加强，成为国民政府控制全国金融、积累国家资本的重要支柱。

(二)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发生后，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地区相继沦入敌手，1938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西南大后方，贵州省会贵阳的工商业和金融业日趋繁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交通银行贵阳支行于1939年1月4日成立开业，直接属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管辖（1949年8月改属交通银行重庆分行管辖），行址在中华南路（今二轻供销公司中南门市部处），经理王彝尊（其后历任经理的有程志颐、邹安众、杨若曾、陈子培、冯树敏等人），副经理胡耀（其后还有杜廷筠、谢仞千、张瑞伯、冯树敏、朱永济等人），襄理王玉书（其后盛敏慧、郭文杰、陈执钺接充）。随着业务的逐步发展，从1939到1944年先后在都匀、安顺、遵义、独山、毕节、桐梓、贵定等地设立了13个办事处、分理处和2个简易储蓄处。

解放前的贵阳交通银行，根据四联总处1942年5月28日颁布的《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规定，其业务范围是：（1）办理工矿交通及生产事业之贷款与投资；（2）办理国内工商汇款；（3）公司债及公司股票之经募或承受；（4）办理仓库及运输业务；（5）办理储蓄及信托业务。

贵阳交行从1939年1月正式开业，到1949年11月行务结束，在10年的时间里，主要经营以下业务：

投资及放款业务

民国17年（1928年）以后，贵州工业逐渐发展。据历史资料统计，1939年全省化工、机械、纺织、采矿等各类工业

已有87家，资本总额694.8万元，到1943年更发展到154家，资本额为1.4048亿元^③。贵阳是工厂企业集中的城市，有些厂矿初创缺乏资本，有的企业需要资金周转，交行按照专业分工，以工矿及公用事业为主要投资及放款对象，其次为支持民生日用品的产销。在工业方面，该行一直是当时贵州最大的工业企业——贵州企业公司的投资者。1939年6月贵企公司开办时，股本总额为法币600万元，该行投资120万元，占股本总额的20%，其后从1940年至1949年的10年中，该行投资始终占该公司股本总额的27.8%^④。1945年，该行为扶持煤炭生产，对贵州煤矿公司投资法币1千万元，并特派副经理冯树敏兼任该公司协理（1949年改派经理朱永济兼任该公司副经理），掌管财权。1947年，联合贵阳中国银行贷款支持贵阳一中烟厂，贷款总额13亿元，中行贷款8亿元，交行贷款5亿元。通过贷款扶持，该厂每月增加烟叶消耗量14万斤，增产卷烟800箱，既促进了烤烟生产，也增加了国家税收。交行安顺办事处对当地黔丰面粉公司给予贷款，据该处营业报告，1945年承做该公司质押透支95万元，后增为450万元^⑤。商业方面，1938年12月，贵阳中国国货公司成立时，交行投资4,000元其后常以抵押透支、进口押汇和贴现等方式向该公司提供贷款。交行贵定办事处对当地裕城烟行也以押汇、买汇方式进行贷款，支持其收购烟叶运销上海、汉口、长沙、贵阳等地的烟厂。贵阳交行1942年6月底放款余额为750.9万元，其中工商放款为536.8万元，占放款余额的71.49%；军政放款212.5万元，占28.29%；私人及其它放款1.6万元，仅占0.12%^⑥。另据该行民国36年（1947年）度业务报告，当年放款平均额为12.7亿余元，其中工矿企业、公用事业的放